

追寻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日本人



2017 年 12 月 13 日，清晨 7 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集会广场，五星红旗升起后又降下，悬在旗杆中间。

这天，是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也正逢南京大屠杀 80 周年。80 年前，侵华日军攻陷南京，6 周的血腥屠城，30 万同胞遭杀害。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当天上午在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仪式。

10 点，8 个花圈献至台上，和平鸽从台下飞起，近一万名民众身着深色衣服，献花、垂首，全城鸣笛默哀……

而在台下坐着的，不仅有垂垂老矣的大屠杀幸存者们，还有一个日本代表团。

作者:张璐
《VISTA看天下》编辑出版

“心像被挖出一样难受”

12 月 12 日，清晨 5 点，天还没亮，年届 70 岁的松冈环就已收拾好行李，奔赴机场。

这是她第 97 次来到中国。近三十年来，松冈环总是抽出工作间隙往返于中日之间，一开始她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给她做过 20 余年翻译的常嫦曾对媒体说，松冈环不仅承受着“日本国内右翼分子的攻击”，还面对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对日本人的戒心”。

去年 7 月，她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下简称“遇难同胞纪念馆”）时，身边坐着的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艾义英。

艾义英出生于 1928 年，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那年，她只有 9 岁。她的父亲、两个叔叔、一个堂哥都被日军残忍杀害，刚刚生产后的母亲为了带着艾义英姐弟 3 人继续逃命，被迫丢弃了刚出生不久的女婴。

“一生长成中，我经常做噩梦，很长时间都睡不好，看到日本人就感到害怕。”艾义英说，她对日本人“又恨又怕”了 80 年。

但是对艾义英而言，松冈环这个日本女人，既不可怕，也不可恨。

松冈环出生于 1947 年，幼时的她从未听到过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史实，“从小到大，我们学到的关于战争的说法，都说败给了盟军。”关于战争最初的记忆是，她的舅舅曾在战时来到中国，一张照片中，舅舅穿着军服，拿着刺刀，“耀武扬威”。

1982 年，松冈环成为了大阪一家公立小学的历史教师，当时的日本教科书上“南京事件”只有大约三行，提到南京大屠杀时，只有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南京城里死了很多人……”

毕业于关西大学东洋史专业的松冈环查找不到够用的资料，她决定来中国，探索真相。

1988 年 8 月，松冈环第一次登上了飞往南京的飞机，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她接触到的第一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李秀英。1937 年时，李秀英只有 19 岁，为了抵抗日军的强奸，她被刺了 37 刀，肚子里 7 个月大的孩子也因此流产。

“我觉得心像被挖出一样难受。”松冈环说，而更让她难受的是，李秀英讲述完自己的经历，说完“这是可恨的军国主义”后，又淡淡地补了一句，至今看到日本人还觉得不舒服。“虽然那个时候，我听不懂中文，不知道她说的‘心里不舒服’的意思，但是我看着她沉重的表情，立刻明白了她的心情。”

松冈环当时下定决心，“必须告诉在家里等待着我的学生们，被潜藏在南京历史真相中的，是怎样的痛。”

两年后，她发起了名为“铭心会”的民间团体。每年，她都会组织部分日本市民到南京进行寻访，还通过召开证言会、和平集会等方式，向日本民众展示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

她追访了数百名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和亲历者，数次活动中，她蹲在地上听着受害者和亲历者的叙述，握着手，点着头，情动之时还流着泪，将他们的证言出版成书、制作成纪录片，举行图片展。

如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越来越少，据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介绍，现在在册的幸存者已经不足百人。

去年 12 月 13 日的国家公祭仪式上，松冈环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又一次相聚，她拉着夏老的

手，问她身体好不好。

她一直希望有一天日本政府能够正视历史，向这些幸存者道歉，对受害者做出弥补，让下一代了解真相。但近几年，日本的言论空间正被挤压，不同版本的教科书被修改，第一线的教师也不能自由选择授课内容。

“我一直很不甘心。”松冈环用清晰的中文说，“很幸运可以见到幸存者，但还是没有办法答应他们说，日本政府会道歉。”

“整个南京城都是地狱”

想见到侵华日军老兵，让他们说出真相，更是困难。

从 1997 年秋天开始，松冈环开始在日本走访参战老兵。

她和铭心会先是 from 日本地方人名事典中找到 1937 年应征入伍，并来到中国的相关人员；然后向 300 名相关人员发出信函，请求予以协助，并从各地图书馆中寻找老兵的战争记忆。此外，松冈环还在东京、名古屋、大阪、广岛等地开设了与追寻南京大屠杀史实相关的热线，供日本老兵找她聊聊。

“当时，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骂我们，斥责我们‘你们干什么’。”松冈环说。

让老兵说出他们的故事、追索真相的过程很是累人。

据她回忆，调查初期，老兵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情况很常见。曾有一段时间，面对挖掘史料的巨大阻力和压力，心情低落的松冈环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

不过，最终，她还是追访到了约 250 名曾侵华的日本老兵。那些曾经参加过“南京战役”的日本老兵提供给她的资料中，有 130 条颇有价值的信息，其中包括 13 条与大规模集体屠杀有关的事实。松冈环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在加害者和被害者的证言中，找到了在空间上完全一致的十几个例证。

几位前侵华日军士兵面对镜头承认了一些在南京太平门惨案中的屠杀细节——用刺刀直接刺死无辜市民；逼迫中国人在埋着地雷的路上走，将这些人活活炸死；从城墙上往中国人身上倒汽油后，点火将他们活活烧死……

“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侵略者，我曾参加过南京围攻，对日本军队的暴行感到惭愧。”在松冈环的陪伴下，前日本军人三谷翔面对镜头，揭露真相。

17 岁的时候，三谷翔作为志愿兵加入日本海军，当时的他笃信“为天皇战死，是最光荣的事情”，甚至在军校念书的时候，他们就被分为红白两队，一队扮演中国人，一队扮演日本人，“那些扮演日本人的学生总是在大喊‘杀了所有中国人’。”

南京保卫战时，三谷翔随日军舰艇“海风”号侵入南京外围，当时他是信号兵。

据他回忆，12 月 12 日，战事正酣，三谷翔在舰艇上看到四个竹筏，以为会藏有中国士兵，便一通胡乱射击，后来才发现，竹筏上面堆满的只有中国人的尸体。

回忆起那段经历的时候，三谷翔用布满皱纹的手拿起桌旁的黑白照片，紧紧捏着，手指微微地抖。

此后，三谷翔奉命上岸，看到岸边有成堆的中国人尸体，“尸体高度有两米，每堆有五六十具。”三谷翔称，那不是军人，而是老人、女人，甚至小孩，当然也有壮年，有的手被绑在背后，有的全身赤裸，有的尸体没有头。

谈到这儿的时候，他闭上了眼睛。“那里不是唯一的，整个南京城

都是地狱。”他紧握照片，双手颤抖得更加厉害，那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寂静，连鸟叫声都听不到。

12 月 18 日，返回军舰的第二天，三谷翔忽然听到一阵枪响，看到岸边有中国人被机关枪扫射，“像是电影慢镜头一样，一个个倒了下去。”他说，“我在 12 月 25 日离开南京，离开前的每一天都是这样的，从早到晚。”

尽管目睹了南京大屠杀，但在接到禁言的命令后，他一直保持沉默，直到 1997 年松冈环开始收集证言——“我想活到 100 岁，让我活着的唯一原因就是想说真话。”三谷翔曾说，安倍政府对过去的历史视而不见，“真想和他打架。”

10 年前，2007 年 12 月 13 日，三谷翔来到南京，参观遇难同胞纪念馆，出发之前，所有人都劝他不要“惹麻烦”，“但我父亲坚持想要道歉，他说那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机会。”三谷翔的女儿说。

那次赴宁，他还曾在南京理工大学作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言。讲话前，三谷翔曾经担心中国学生的愤怒，但演讲结束后，很多学生都走上台前与三谷翔握手，一个男生说三谷翔道出的真相让他消除了对日本人的“偏见”。“和平的时代真好，能够这样相互理解。”当时，三谷翔颇为感慨。

去年 9 月 9 日凌晨两点，98 岁的三谷翔在家中去世。“如果我不谈论日军对其他人犯下的暴行，或向南京人民请求宽恕，我就不会安息。”他生前曾说。

“是疯子，是卖国贼，是叛徒”

“平静的生活中，和平的景象下，每年我们至少有一个时间，有一天，来回首往事、铭记历史，让这份痛感重新唤醒。”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

自 2015 年 10 月来到纪念馆工作后，他几乎每天都会在馆里走一走。

每次看到馆藏中小朋友虎头鞋上散落的铜铃、女性用来束发的发簪、擦在脸上的半瓶雪花膏，张建军就会很有触动，“想到当时那么鲜活的生命，妇女、儿童，还有很多无辜的人，就在某个瞬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残害，确实感到很伤痛。”

也是从张建军调任馆长那时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南京大屠杀的大众化传播，构建人类共同记忆就变成了张建军的工作之一。

其中很重要的一块便是对外传播，他们每年都将史实展带到国外，也把史实资料一一外译。每一年，纪念馆也会接待不少外国友人，尤其是来此的日本人。

笠原十九司是日本历史学界著名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收集了日本国内“否定派”否认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书籍，作为他的“研究靶子”。

“在日本史学界，很少有人会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都不是历史学家。”此前在国内的演讲中，笠原十九司说。

上世纪 80 年代初，笠原十九司是参加“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的资深学者，多次到南京实地调查采访，听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

以前，笠原十九司一直坚持维护历史真相的行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成为日本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人物，但如今，“几乎已经没有日本媒体来采访我了，他们都在刻意回避。”他说，如今日本的一些高官都是侵华战争的军人后代，“他们想极力掩盖祖先的罪行，因为这将对他们自己的地位和面子有负面影响。”

这两年他再次来到南京，张建军负责接待，“我们围绕历史，有很多共识的地方，成了好朋友。”张建军说。

笠原十九司回国那天，张建军起了个大早，去酒店送行。笠原的车离开五十米后，又突然倒了回来，笠原下车和张建军来了一个拥抱。

“要知道，这在日本人而言是一个很少见的动作。我很感动，我们都是为这段共同的历史而努力着。”张建军说。

除了回避，松冈环在这些年则经历过不少“恐吓”——

“他们在我工作的学校附近，挨家挨户发传单，说我是疯子，是卖国贼，是叛徒。”

她在日本参加会议、放映资料影片时，常有右翼人士在外大按汽车喇叭制造噪音。有人说，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有人称她是“中国的特务”；还有人会尾随她到地铁站。

松冈环说，自己等地铁时会很小心，绝不站在靠近站台边缘的地方；家门要锁两道锁，也从不轻易开门接待访客。

最让她难过的是，丈夫的一位朋友常常给予她支持，却遭人推到车前而伤重过世。所以，她“的确也会怕，但是不会停”。



日本兵三谷翔来到南京，参与南京大屠杀悼念活动